

基尼亚尔与其中国影子的自我认同

张 璐

法国当代作家帕斯卡·基尼亚尔(Pascal Guignard)以《游荡的影子》一书荣获法国2002年龚古尔文学奖,也正是在这一年,他开始为中国读者所认识。《当代外国文学》率先对这位作家进行了介绍,刊登了基尼亚尔与评论家卡特琳娜·阿尔冈的访谈录¹。《译林》杂志又在2003年第2期刊登了其著作《最后的王国》的节译²。2007年,其获奖作品的全译本《游荡的影子》³由译林出版社出版,在中国读者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。《文汇读书周报》、《南都周刊》、《晶报》、《新快报》、《文学报》等都先后发表了作家和文评家的评论,其中有育邦的《读书是一种漫游》,罗豫的《游荡在精神的隐秘空间》、黄荭的《大吸一口气:就是阅读》等。基尼亚尔先后写作了40多部随笔和小说,主要作品有《符腾堡的沙龙》、《香堡的楼梯》、《性别与恐惧》、《思辨性修辞》、《仇恨音乐》、《秘密生活》、《罗马平台》等。《最后的王国》六部曲是近几年的新作,分别为《游荡的影子》、《关于过去》、《深渊》、《极乐世界》、《肮脏至极》和《无声的小船》。获得龚古尔奖的作品《游荡的影子》是一部奇特的著作,它既不是哲学性的思辨,也不是渊博的随笔,更没有小说性的叙事。作品汇集了大量文学片断,夹杂着个人经历、历史事件和个人思考,而且是一些“小小的思考”。作者在18个月大的时候便被孤独症缠身,直到16岁才恢复。然而正是这种孤独的“静”让他开始写作,一言不发地在语言中遨游。他自述说,他从小就喜欢思考,从黄昏起直到日出,睡在床上辗转反侧,觉得能静静地思考,要比睡觉强上千百倍。于是,他对现代社会就有了一点点看法,对世俗有了一点点感悟。因为他“只追寻那些战栗的思想。有那么一点红光,它属于心灵的深处。”⁴

基尼亚尔所说的“游荡的影子”,其实是那些古往今来的圣贤,远离尘世的隐修者,超凡脱俗的思想家。书中提到了哲学家卢克莱修、伊壁鸠鲁、奥勒留、尤里安、笛卡尔、伏尔泰、卢梭;有宗教人士耶稣、圣西朗、冉森、蓬夏多、阿尔诺;有文学艺术家荷马、维吉尔、但丁、马拉美、勒南、夏尔梯埃、维尔科尔、伦勃朗、塞万提斯、莎士比亚、勃朗特姐妹、菲斯特伯雷、杜加拉姆;有日本文人清少纳言、和泉式部、善竹弥五郎、谷崎润一郎、大江健三郎;还有中国文人伯成子高、老子、公孙龙、李商隐、韩愈等;这些影子穿越不同时期和各种文明在时空中游荡。而在安谧恬静的大自然中漫步,在各民族的多元文化中畅游,探索自己的生活方式,寻找自己的栖身之地,在“不可见物和文字、古人的影子、

¹ 《帕斯卡尔·基尼亚尔访谈录》,卡特琳娜·阿尔冈辑录,杭零、陈凌娟译,《当代外国文学》,2002年第4期。

² 帕斯卡尔·基尼亚尔《最后的王国》(摘译),刘成富译,《译林》,2003年第2期。

³ Pascal Guignard, *Les Ombres errantes*, Edition Grasset, Paris, 2002.

⁴ 基尼亚尔,《游荡的影子》,张新木译,译林出版社,2007年,第5页。下文引文只标注页码。

寂静、秘密生活、无用艺术的无用统治、个性与爱情、时光与乐趣、自然与欢乐”（33页）中寻找充满快乐的“最后的王国”，正是作者对人生和生活的追求。尤其是中国影子及其智慧对他颇具魅力：老子的世界观、李商隐的诗歌、韩愈的散文、公孙龙的诡辩、伯成子高的境界等等。基尼亚尔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游荡的影子，远离尘世的生活，潜心研读古代经典，做一个隐居的文人、文化的游客和古代圣贤的对话者。《游荡的影子》这部作品就是一次文化旅行，正如他自己精辟概括的那样，“在读书中有一种不寻求达到目的等待。读书就是漫步。阅读就是游荡。”（46页）在与中国影子的对话中，基尼亚尔就名字与身份、时间与进步、生活艺术等方面进行了探索，希望从中国影子中汲取一些他理想中“最后的王国”的有机成分。

1、 中国文人的身份

基尼亚尔首先关注的是文人的身份问题。纵观中外历史，文人在政治舞台和社会生活中常常处于一种尴尬的两难境地。甘愿沦落为“御用文人”者虽然能显赫一时，但终为同仁及后来者所不耻；而能保持其自我主体的文人则常常被排斥于政治生活之外，处于创作者的孤独之中。普鲁斯特曾经指出斯万的双重社会身份：社会的自我和艺术家的自我。“需要牺牲的自我，就是杰基尔博士，他在社会中享尽荣耀，但不能创作任何作品。而需要采纳的自我，那就是海德的自我，因为在他的内心保持着作家能给世界带来的特色”⁵。在《游荡的影子》结尾处，基尼亚尔列举了罗马人的书记官索菲尤斯的例子，说他在苏瓦松战役失败后逃到图鲁兹等待他的主人，“小心谨慎地看管着图书馆”，坐在橡树的影子下，当喝酒吟诗的文人，去探寻那些“潮湿的影子”。在对文人身份的探寻中，基尼亚尔借鉴了中国的两个影子，分别从名字和出生等两个方面对文人身份进行了认定。

第一个影子就是《金瓶梅》中的温必古，“他不到四十岁，穿着和梳妆如同书生，白净的牙齿，面颊、下巴和嘴唇边留着长长的胡须。”（5页）中国文人的外貌给人一种新颖的感觉，一种文质彬彬的气质，谦逊而含蓄。当西门庆问他：“请问尊姓大名？”温必古回答道：“不才名‘必古’（必须效仿古人），字‘日新’（一天比一天更新）。”（5页）相对于《金瓶梅》中原话（“学生贱字日新，号葵轩”）而言，基尼亚尔略作了一点改变，旨在突出中国文人字号的两面性和名字所承载的期待，从中悟出一个道理，即“我每天都在更新自己，以满足效仿古人作品的需要”。中国古代文人的姓名是父辈所赐，不可随意更改，但是个性化的字号是成人之后自己所取，突显个人的人生哲学、态度，以及个人的文化艺术修养。在中国文人的身份标签即姓名与字号的

⁵ Luc Fraisse, *Esthétique de Marcel Proust*, SEDES, Paris 1995, p. 24.

对比中已经蕴涵着新与旧的辩证概念，象征了文人现有的文化语境和永远的创新期待，也暗示了作家的社会身份和艺术家身份之间的对立，尤其是在艺术创作中两种身份的纠缠不清。因为“作家和思想家一样，知道他们身上谁是真正的叙述者”（11页）。作家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要给自己确定好身份，寻找一个名正言顺的名字，一个名副其实的，一个真正作家的名字。然而，如今在西方，这个名字已经失落，已经模棱两可：是文化官员还是艺术家？“落失的名字在哪里？失落的名字是在哪里失落的？在这个名字上坐落着最后的王国。”（16页）应该像中国文人那样，“将自己融入更广大的群体。他们重新找到了古老的快乐，这就是要把自己投身于一个包容体。他们抛弃语言学习带给每个人的主观性，抛弃姓名鉴定给予的那些可疑的特权。……享受着受虐狂的众多的、重复的、拜物教的、着魔般的、永久的快乐。”（146页）应该像图鲁兹文人那样，回忆着古代文人的名字，回味着昔日的轶事，这样心里就会感到非常快乐。

第二个影子是老子。老子以其特殊的出生方式隐含了文人的二元身份。基尼亚尔对老子的名字作了解读，说“老子”既是像老人的孩子（*Enfant de Vieux*），又是老孩子（*Vieil Enfant*）。像老人的孩子，是说他虽然是孩子，但是一副老人模样；老孩子，是说他孩子，但是永远长不大。两者之间又出现一种对立，揭示出老与少的二元身份。

“中国的古人说，老子在他母亲的子宫里等待了八十年，然后才决定来到气流和光线中。老子显然是一位胎生者”（6页）。的确，根据张守节的《史记正义》，老子的母亲怀胎八十一载，在李树下从腋下产子，刚出生的老子便是白眉白胡，一副老人的样貌。在《访谈录》中，基尼亚尔将这种出生前的世界称作第一世界，出生后称作第二世界。在西方文化中，这个出生前的第一世界似乎并不存在，因为西方人通常是从出生时开始计算年龄，尽管胎儿已经在母亲子宫里成长着，但人们仍然认为他还不存在，甚至要到孩子开始具有自我意识时，才真正拥有身份。而在中国，传统的方法则从胎儿孕育时就开始计算年龄。老子的情况正好证明了这个第一世界的存在，也是基尼亚尔从中国文化中发现的奥秘之一。基尼亚尔继尔认为，“我们是胎生的。我们在出生之前就已经生活。事实如此，我们的心脏在我们呼吸之前就已经跳动。我们的耳朵在我们嘴唇发现空气存在之前就已经听到声音。在我们的眼皮睁开之前，在我们的眼睛被照花、然后被照眩、然后看到东西之前，在我们的喉咙变得干涩、然后窒息了一刻、然后吃了一口空气、然后模仿一些其语气好像让人放心的话语之前，我们就已经在灰暗的水中畅游过了。”（61页）老子哲学的信条之一是顺其自然，无为而治。而对于人生，不管是在母体中被动地生存着，还是出生后主动地生存着，就已经造就了人的身份，并且在后续的人格发展中，一方面保持着永远不变的儿童本性，老孩子的天性，另一方面又造就人的后天性格，老人的孩子。这种二元身份不仅在性格上反映出来，而且会影响到文人在其他方面的行为，确定其价值观的取向。

2、 中国文人的智慧

基尼亚尔对中国圣贤的智慧欣赏有加。对时间的认识、现象与本质的认定等尤其激发了他的哲学思辩。书中说老子在母腹中孕育了八十年，这种夸张的说法是要引起人们对时间的别样认识。他认为，时间是自然的时间，而非人为表述的时间。在人类用语言表达时间之前，时间就已经有了一个“从前”，正像在人类社会之前就已经有了个体的人一样，“在太阳照花我们的眼睛之前，我们就已经认识了生命，我们已经在那个生命中听到了某种既不能看见也不能读到的东西。”（122页）在人为定向的时间里，在用语言链编织的时间里，时间似乎是历史长河中的涓涓细水，没有特定的时刻或高潮时段，其实这并不符合时间的自然轨迹。实际上，现象和过去是在前进的每一次浪潮中建立起来的。当代人所具有过去与影子王国的每个过去是绝然不同的。庄子的过去不是赫拉克利特的过去。过去与现在一样生活着，它在现在中展现着它的面孔。时间一直经受着改变，船只、纤夫、沿着河岸的道路、时间的马匹、马匹的跳跃、当时的天气、饥饿等都在改变着时间。时间又是一种游戏，它被放置在当前境况的中心，处于喷射状态，位于斜坡上，位于速度的飞逝中，处于过去的倾吐中。

从思考时间出发，基尼亚尔又对进步的概念进行了探索，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。作品首先对古今许多社会现象作了批评，而批评的焦点之一就是“进步”这一概念。作者认为，现在所谓的进步就是在“清除过去的时间”，形成社会性的对过去的整体“遗忘”，这是人类文明走向消亡的征兆。人们总以为时间具有方向性，从起源到终结是可以定向的，可以被赋予意义，“愿意相信有一个初始的数字代码，有一个方向或对未来的一个承诺。”在西方哲学中，黑格尔就曾经将时间定向于人类的历史。作者则认为，这种定向就是走向死亡。尼采在《不适时的评论》中就谈论了历史的“作用与缺陷”问题，指出这是在“让死人埋葬活人”。“进步”这一概念既能启发政治的、个人的和社会的实践，也能将它们混淆为一体，从而抹杀过去的时间和历史。作者通过展示历史事件，告诉读者战争是怎样产生的，人们是怎样糟蹋作品和文字、动摇人类文明基础的。工业文明的发达、消费商品的丰富、信息技术的快捷，从表面上看是一种进步，但这种进步的代价是牺牲自然生存环境和传统价值体系，即否定过去的时间。作者以伊努伊特人为例，说伊努伊特人有一个谚语：赠品培养奴隶，鞭子驯服走狗。“于是西方世界开始保护人种学。实地调查变成了高贵的借口，以向世界上那些仍然拒绝使用银行货币的偏僻地方投资，以向最贫穷的人的眼睛传染欲望，使他们在幻影中破产。赠送的医药和食品破坏了传统。救助使自由定居于一地。通过使各个群体屈服于工业产品，屈服于酒精，救助使他们向无用消费和头脑迟钝开放。通过金钱把他们紧紧抓住，救助把它们牢牢系

在信贷上和社会羞辱上”（85页）这就是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后果。

在正确认识时间和进步的基础上，我们要在时间中寻找一种通向永恒的途径。“必须迎接这个机会的喷发着的废墟，导致破产的慷慨，颤抖着的和不可见的火热光晕。”

（136页）通过这些打破常规和不合时宜的表述，作者期盼着一种永恒的回归。德勒兹曾经谈到永恒的回归，“在创造中有一些永远新颖的价值，永远不合时宜的东西，永远显示时事性的东西。即使这些价值已经被社会所承认并吸收，它们还会面对其他的力量，向社会请求另一种性质的无序力量”⁶，以寻找新的创造力和永恒的回归。作者愿做一个“不合时宜的人”，在谈论自由、战术、自我、生活、作品、书籍、文化、立场、价值观、轮回形象等时，他都有不合时宜的（抑或永恒的）看法。“犹豫不决是一种比自由更为深刻的可能性，偶然是一种比战术更为智慧的安排，遗忘，愤怒，渴望，突然跳出的戒备是结果，不是存在的结果，而是时间的结果。”（37页）要回到事物的本质中，“每一件作品都可以比作一块在水中跌碎的岩石；每个季节也是；许多的圈在水中扩散；它们迷失在未来之中，而未来又不断重复，正像这些圈所创造过去一样；它们迷失了，但并没有消失”。（37页）总之，不合时宜的东西，本质的东西才能被称为艺术。“艺术是与一次并不奴役它的分裂的永恒同时的。在人与兽类、社会与反社会的、秩序与非秩序、被装饰的与令人厌恶的、天堂的和地狱的、生命与死亡、形式与非形式之间那些更替的树形亲缘关系被固定之前，它就产生了。”（104页）艺术作品是暴露的作品，它的迷惑作用在于能够相隔数千年，牵引出对某种已经不存在的东西的怀念。这就是艺术能够实现永恒的秘密所在。

公孙龙子的“白马非马”论，揭示了一种现象与本质的辩证关系，令基尼亚尔惊叹不已。传说有一天，公孙龙子骑着一匹白马要进城，守城门的官员说，依照规定马不可以进城。于是公孙龙子就开始了他的诡辩，即白马非马。他最后说服了守城官，骑着他那匹不是马的白马进了城。他的论证是这样：“马”指的是马的形态，“白马”指的是马的颜色，所以白马不是马。作者在第十二章中恰恰回顾了马的形态，说它们“昂着头，不是醒着的，也不是睡着的，像一群已经不感到饥饿的野兽，像一群野性所抛弃的猛兽，像是一群被带刺的铁丝网围着的巨大野兽的记忆。当我靠近时，有一匹马打着鼻响，摇摇晃晃地从草地上站起来，以一种笨拙的行动、一种不平衡向我走来，但也带着一种令人惊讶的优雅，似乎它从某个千年中醒来。”（38页）从语言表述来看，作者认为沉默与说话是相反的举动，重要的东西往往处于“语言的背后”，可以听到“不可见物后面的王国”。我们人类已经很难有这种体会了，也许某些动物还能不自觉地显示这种天性。“鱼儿们还要浮到水面上来。大吸一口气，不至于闷死。大吸一口气：就是阅读。”（58页）从思想内涵来看，基尼亚尔借助白马非马的典故，揭示了现今西方盛

⁶ Gilles Deleuze, *Ile déserte*, in *Nietzsche*,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, Paris, 1965. p. 175.

行的人为性，即以表象代替实质，以假象代替真实，以神话代替真理。“在人类历史上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如此多的神话，如此多的神话竞争：神化了的妇女，被敬爱的死者”，“民主是一种凶狠的清教徒的宗教。是比伯里克利时代更具暴力性、更加不平等的民主。”（17页）

此外，人类在改造和控制自然的过程中，已经将自然异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“有一只可怕的手突然伸向了地球：那是一只单向交流的手，其目的只想抓住地球，别无他意，它也没有别的高招，只知道向地球施加它的压力，也没有别的节奏，只有那压力不断增长的单调无味。”（32页）这是一只专制的手，它将自己的协调作用强加给地球，是一美元纸币破裂时发出的泛绿的声音。商人们成功地制造了市场，并且依赖市场的整体性，成为屈服于市场的臣民。当今的快乐就在于售出以最低价成本制造出来的物品，把它们卖给所有的人，也就是说卖给整个人类。这是消费社会的典型特征。人们依靠商品的大恐怖来贩卖和平，迫使物品服从于人类的欲望，人们对商品的要求并不是它的使用功能，而仅仅是满足拥有它占有它的欲望。而从得到这物件时算起，其寿命往往很少超过获得它的那一天。物件都是易碎品，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，也无需达到永恒，仅仅是些可交换物而已。而且人们的话语也成了商品，每一句话一经说出，它就可以定价，这就使得电视屏幕爆满，屏幕上出现了大批大批的使用语言的胎生动物，它们的面孔越来越模糊。正如波德里亚在《冷记忆3》中所说的那样，“所有这些新闻界和巴黎知识分子圈里阴森的面孔，都在电视摄制大厅里。所有人的尾巴都冻结在冰河里。”⁷那些沽名钓誉的文人墨客，就像那只想用尾巴钓鱼的狼，其结果使自己处于更为难堪的境地。

3、 中国文人的生活

身份的认同，智慧的借鉴，使基尼亚尔更加向往中国文人的生活艺术。韩愈和伯成子高便是体现这种生活的影子。书中说韩愈“生于公元768年，792年考中进士，他厌恶佛教。当佛陀的一根骨头到达长安时，他没有跪拜。他用书面方式也是一种危险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不满：反对围绕一根骨头的恩惠。他写了许多短篇的散文，内容紧凑，言辞激烈。”（92页）首先，韩愈的影子显示出的是文人刚正不阿的形象。他虽然二次被贬，却一直保持着文人正直的气节，“有一天，他伸开手上的五个手指。他神秘地说，他的每个手指间还有初始曙光的影子。”相信自己的价值观是高尚的，相信自己掌握着真理。如果不能直接用政治方式干预社会，就用文字去勾画理想的世界。回想加缪也有过同样的经历，加缪不像萨特那样入世谋取正义，他只想建立一套解释世界的话语，采纳一种捍卫弱者的立场，主张力取幸福。他说“放弃美，放弃与美相连的官能幸福，

⁷ 让·波德里亚，《断片集——冷记忆3》，张新木等译，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21页。

专一地为不幸效劳，这要求一种我所缺乏的崇高……对于正义的长久要求耗尽了爱，而正义却恰恰产生于爱。⁸”世人为何就不能张开双臂拥抱爱与美，如果不能充当敏锐的政论家，那也可以担任布道者的角色。于是韩愈便长期进行凝视、沉思和写作，并且形成一种古代散文的风格，其句法清晰，词汇精确，语法成分重复，表述透彻。“他憎恨句子成分的省略，宗教，结绳中的卑鄙，城市居民习俗中的卑鄙，情人拥抱中的卑鄙。他说：生长着的草在生长。”（92）事物的自然形象简洁明了。他喜欢晚间影子里的小径，白天到来前的浓雾，阵阵劲风。他在《山石》里写道：我愿与影子和一位同伴结伴，我们三人一直生活到很老不回返。

基尼亚尔欣赏中国文人的身份，喜欢读书和思考的生活，认为人类应该更多地感谢阅读，而不是武器。他说在中国，书面文字的阅读建立了文明。倘若哪一天所有的人都停止阅读，文学就重新变成被定了价的东西。作者自述曾经独自来到荣纳河边的一个小镇，从船上卸下六只装满书籍的大箱子，在那里读书度过整个夏天。“夏天开始得不错。可以指望不会有任何人打扰。”“没有一点假装的快乐，在我周围，没有东西能引起我的欲望，让我丢下所有的事情去自杀。幸福感油然而起。我读着读着。幸福吞噬着我。我读了整整一个夏天。”（77页）在那里，流水般的阳光泛着金光，从天穹的深处流向荣纳河；在河面上，在阴暗中，一叶小舟抹着金光，显露出绰约的身影，一只扁平的小舟，空空的，好像是空空的，匆匆行驶着，静静地驶向下游。他也喜欢海边的美景，“大海没有泡沫，光滑，极为光亮，闪耀。每一个海浪都像一片在上升、在前进的金瓦。”（65页）于是，“在1994年4月的一天，当天气晴朗时，当太阳耀眼时，当我走出卢浮宫时，我是否突然加快了步伐？有一个加快了步伐的人穿过了塞纳河，他看着王家桥拱下的河水，河面上完全被一层白色的波光罩着，他看着波纳街上蓝蓝的天空，他跑过去推开塞巴斯蒂安一波顿街上的一扇大木门，他一下辞去了身上所有的职务。”（145页）

另一个影子就是伯成子高。书中说，当尧帝管理国家时，伯成子高接受了一块封地。当尧将国家传给舜后再传给禹时，伯成子高便辞去封地而拿起了犁。禹于是去看他，看到他正忙着耕地。禹恭敬地对他说：“先生，尧帝给了你一块封地。为什么你现在想要放弃封地而耕种你自己的地？”伯成子高回答说，“我不是想要放弃，我是已经放弃它了……我觉得，在尧统治时，百姓不想这问题。现在你奖赏的很多，您惩罚的也很多，但干净的东西不是与脏东西分离的，男人也不是与女人分离的，恶也不是与善分离的，外人也不是与兄弟分离的，名也不是与物分离的。这是种种将要长期持续下去的混乱的开端……你怎么还不走？让我安静！让我安静！请你不要再打扰我的劳动。”（144页）这就是伯成子高的回答。基尼亚尔还列举了西方的一个影子，说要做游荡的影子，

⁸ 转引自《加缪全集》散文卷I序言，湖北教育出版社，2002年。

就得像提比略皇帝那样，做“野狼，他憎恨城市，不要帝国，杀死上帝，逃离罗马城。他情愿生活在卡普里岛的高处，在俯临大海的岩石的影子里”（3页）。作者真正理解到，父亲的去世让他对光宗耀祖，对事业的成功，对未来的雄心都淡漠了。“在我们平生所做的事情中，大部分是做给生我养我的人看的。随着他们的谢世，我们的某些雄心也随之消失。我竭尽全力去教书，干出版工作，去搞音乐演角色，其实我对集体生活并不在行。实际上还有比轰轰烈烈的生活和始终不渝的爱情更为古老的生活，一种远离社会的孤独生活。我要的就是这种生活。”⁹ 他低声说“别耽误我！”又更低声地说：“别耽误我！”（144页）他与伯成子高异口同声，融为一体。

与中国影子的对话，对中国文人的理解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，使基尼亚尔对中国影子作了总体的肯定。他借助这些影子符号对西方的观念进行反思，承载自己的精神向往，主张担当起时代的影子，为现代人寻找那自由自在的最后王国。就像钦齐那图斯那样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重新回到他的田里；像伏尔泰那样，耕种他自己的菜园，那伯成子高那样，耕种他自己的田地。面对当今这个巨大的集市，面对物欲横流的社会，面对追名逐利的庸俗生活，基尼亚尔想通过远离人世的隐修生活，通过阅读和写作，通过艺术回归到人性的本源，追回原始的幸福，回到他所期盼的“最后的王国”里。就像他书中温必古所说的、由他自己所杜撰出来的一样：“有时候，当我在笔林中游荡得疲倦时，当我在墨溪中漂流得累了（劳累）时，我便摘下四方帽，离开旧书的气味。我的手在绸裤中摸索。我闭上双眼。神灵的眼泪喷射而出。我将鼻孔凑近昔日的气味。这就是我所过的生活。”

⁹ Propos cité par Catherine Argand, journaliste au magazine *Lire*, décembre 2002 / janvier 2003.